

国家认同视角下的新加坡街路译名研究

林雨欣 崔 峰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 637332)

[摘要] 本文从新加坡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考察:(一)新加坡独立前与独立发展初期(19世纪—20世纪60年代初);(二)新加坡独立发展时期(1960—80年代);(三)新加坡独立后期(1980年代后期至今)。将新加坡街路的译名策略纳入新加坡政治、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分析新加坡街路译名所反映的意识形态和采用不同翻译方法的原因所在,考察这些译名与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意识的关系。

[关键词] 翻译;新加坡;街路译名;国家认同;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358(2017)01-0027-09

新加坡政府对街路地方名称的规划勾勒出国家发展的蓝图。对街路地方进行命名不仅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指南,也体现了执政当局在国家独立、发展过程中如何建构新加坡人民的国家认同意识。目前尚未有相关论文对新加坡街路地方的译名进行系统考究,但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加坡这个重视多元文化特性的国家中,译名的意义承载着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重任,译名中任何语言符号的运用都肩负着新加坡政府尝试铸造“新加坡身份”的目标。

一、新加坡独立前及独立发展初期(19世纪—60年代初)街路地方译名由来概述

1819年至1942年,新加坡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市政当局建立起一套街路名称系统以达到识别与划分地区的目的,一套清晰有规划的系统对新加坡的市政发展不可或缺。当时的殖民统治者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法古哈(William Farquhar)和拉菲中尉(Lieutenant Rafael)开始为这块殖民地进行规划。莱佛士爵士指示市镇委员会“每一条街道都必须拥有恰当的名字”(Buckley, 1965: 84),而且“警察有责任确保街道有规则地编号”(Buckley, 1965: 84)。官方的街路名称是在市镇会议上由市镇委员批准的^①。虽然有些建议源自于市镇委员会主席、委员以及产业业主,但是街路名称的提议通常由市镇评估员提出;一旦决定后,新定下的街路名称或受更改的街路名称便会在报章上刊登,同时各政府部门的总管(如总警司、土地专员等)都会得到通知。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为街路命名的工作由

“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Street-Naming Advisory Committee)负责,首届委员会在1967年2月由财政部委任。委员会以国内税务局属下的估价和估税署作为秘书处,成员来自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如新加坡邮政公司、市区重建局、建屋发展局、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部门等(Dewan Bahasa Files, 1967: Files 2/67, 70/59, and 515/59)。委员会在每个月举行的会议上考虑私人发展商、建屋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和其他机构的推荐和建议,再决定如何为新发展地区出现的新街路命名。

1950—1960年代的新加坡街路地方名称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②:首先是和英国殖民地有关的街路地方名称。在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时期,新加坡的街路地方名称系统深刻地反映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记录了非物质化的殖民想象。当时新加坡的多数街路地方名称与宗主国英国有着紧密关系,或取自英国街名或纪念英国名人。除此之外,街路地方名称的类型还有:以马来文命名的街路地方名称;和种族与方言群有关的街路地方名称;纪念名人的街路地方名称;描绘性街路地方名称^③;主题性街路地方名称^④;以及以神话传说命名的街路地方名称等。

(一) 街路地方译名翻译方法的运用

根据有关学者的分析,一个街路名称的结构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专名(Specific Term)和通名(Generic Term):例如安祥路与文达街,以“安祥”和“文达”为专名,而“路”与“街”为通名。专名代表着该地的地理、历史、建筑或其它方面的特征;通名则代表街路的类型(许永顺 2002: 30)。

[收稿日期] 2016-04-26

[作者简介] 林雨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新加坡公务员,研究方向:新加坡历史与翻译研究;崔峰,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生导师,南洋理工大学翻译副修课程负责人,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史研究。

新加坡作为曾经的英殖民地,行政语文为英文。独立前后,新加坡政府对于街道名称翻译成华文并不重视也没有立下准则,而在没有任何街路译名标准可供参考的情形下,民间不同群体便以不同的翻译方式为街路名称进行翻译。因此,民间的华文译名并没有统一的版本,而且存在着不少谬误以及不雅的措辞。此外,华人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对于英文街路名称的发音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因而通常衍伸出一地数名或一名数地的情况。

将潘醒农《东南亚地名街名录·新加坡街名录》(新加坡:南岛出版社,1959)以及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的《星马通鉴》(新加坡:新加坡世界书局,1959)对比后,即可看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两者采取的不同的翻译方式。(表1中,音译以粗体字表示,直译以斜体字表示,方言音译以下划线表示)

表1

官方街路地方名称	潘醒农翻译版本	星马通鉴翻译版本
China Street	支那街	中国街
Fullerton Road	浮尔顿路	富尔顿路
Gopeng Street	务边街	鹅兵街
Mosque Street	摩士契街	摩士街
New Bridge Road	<u>纽吻立芝路</u> ,新桥路	<u>纽吻立芝路</u>
South Bridge Road	<u>哨吻立芝路</u> ,桥南路	<u>哨吻立芝路</u>
Tanjong Pagar Road	丹戎巴呀路	丹戎百葛路
Upper Circular Road	上沙球拉路	盒吧沙球拉路
Upper Cross Street	上乞洛士街	盒吧乞洛士街
Upper Hokkien Street	上福建街	盒吧福建街
Upper Pickering Street	上必麒麟街	盒吧必麒麟街
York Hill	育山	约克山
Ann Siang Hill	安祥山	安祥禧
Dickerson Hill Road	狄更生山路	狄更逊禧路
Pearl's Hill Terrace	巴尔士禧台	珍珠山台
Raffles Quay	莱佛士基	莱佛士溪墩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发现,潘醒农的翻译版本与《星马通鉴》翻译版本有着明显差异,二者在翻译方式的选择上交互运用了音译法和直译法。造成这种一条街道名称出现不同译名版本的主要原因在于译者间缺乏沟通与共识,以及当时没有任何可遵循参考的官方翻译准则。

(二) 地域方言在译名里的糅杂化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分四次高潮期,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结构大致在第二波移民高潮期间(十九世

纪中叶开始至二十世纪初)逐渐形成。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中国闽粤沿海地区和客家地区,主要讲闽南话、广府话和客家话。在新加坡,由于闽南人较多,当地华人自称的福建话实际上指的是闽南话。不同地区由不同族群群居而住,形成他们的“地盘”:潮州人住纽马吉路、驳船码头一带地(吴彦鸿,2008:55);福建人在福建街、厦门街、直罗亚逸路(吴彦鸿,2008:41);广东人在牛车水、珍珠街等(吴彦鸿,2008:42)。他们组成自己的方言群,口操自己的地域方言,因此难免会掺入自己的方言为街路名称进行音译。

《巫来油通话》(新加坡:永成书庄,1939)是新马一带最早的马来语与华文通译对照本。该书包括马来语和华族各种方言的不同通译对照版本,以为华侨学习本地通用的马来语言提供方便。书中记录了约五十多条华文及马来文对译的街路名称,均以闽南话来翻译,如表2所示:

表2

官方街名	华文译名	闽南语注音
Telok Ayer	直落亞逸	[tit] [lok] [a] [i]
Paya Lebar	吧野黎峇	[pa] [ia] [le] [pa]
Pandan Besar	班蘭勿殺	[pan] [lan] [but] [sat]
Telok Blangah	直落文壠亞	[tit] [lok] [bun] [laŋ] [a]

再结合表1中所示的方言音译如“溪墩[k'oi] [k'i]”是闽语音译“Quay”;福建话音译“Upper”为“盒吧[ab] [ba]”,我们可以发现早期华人不只利用地域方言互相沟通、以方言群聚居,地域方言更是影响了街路名称的翻译,在译名里糅杂化了。

(三) 方言字与地域字的采用

地域方言是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的沟通语言,不同街路译名的方言音译更可让人一窥当时不同地域族群分而聚居的地区。方言的使用不仅体现在音译上,也体现在译名的书写上,也就是方言字的使用——即以书面表达汉语方言时所使用的汉字。当没有常用汉字来表达方言意思时,译者便使用生僻字或创造新字。如表3所显示的一些早期街路译名里出现的方言字,这些字现均已被修订或更名。

以下这些方言字如“膀”、“菴”在《新世纪高级汉语词典》(新加坡怡学出版社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等新加坡华人常用汉语词典里已经查找不到“墩”在字典里也特别注明为“闽语”(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2000:1004)。方言字在街路译

表 3

方言字	官方街名	华文译名
菴	Lorong Ampas	羅郎菴巴士
	Kampong Amber	甘榜菴峇
叻	Siglap Road	實乞叻路
	Sirat Road	實叻路
	Jalan Ulu Seletar	惹蘭于魯實乞叻街
	Lorong Muallap	羅郎麻叻
勝	Ayer Rajah Road	亞逸勝惹路
	Jalan Klapa	惹蘭屈勝巴街
	Jalan Rajah	惹蘭勝惹
	Tanah Merah Kechil	丹那罵勝結舌
揸	Bukit Chermín	武極揸盟路
	Binjai Park	明揸苑
	Jalan Jamal	惹蘭揸摩
	Jalan Jamahat	惹蘭揸馬合
墘	Collyer Quay	哥烈溪墘
	Earle Quay	亞里溪墘
	Raffles Quay	萊佛士溪墘

名里的使用反映了地域方言在早期华人移民沟通中扮演的重要地位。它们后来被更易、取代,则与新加坡国家政策的改变密切相关。

二、新加坡独立发展时期(1960—1980年代)的街路地方译名与国家认同的建构

1965年,刚脱离殖民统治又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失败的新加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自成一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便是安抚、团结民心,鼓舞人民树立起建设新国家的信心。上文提及的“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建构基本的国家认同,因而从人民日常居住的生活环境着手进行重整尤为必要——于是,新加坡独立后,针对街路地方名称的命名与翻译遂产生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为了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团结不同族群的民心所向,新加坡政府在街路译名上主要采取了如下手段以达到巩固新政权、稳定民心的目的。

(一) 统一不同华族方言族群为一个种族群体——“华人”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国家,各族有其传统的价值观”(同上),要人民产生国民意识、国家认同及“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并非易事。

根据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定义,国家认同是通过政府来建构的,而政府就以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来实现。国家机器分为两种:

a) 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以强制性手段来制约国民的,如有法律效益的条例和法令或政策、国民服役、升降旗礼仪式等。

b)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软体设施,也就是以非强制性的手段来进行潜意识层面的意识形态灌输,而这些手段可以通过宗教、教育、家庭、文化、文学、传播,如电影、广告、电视剧等来实行^⑤。

我们可以注意到,街路地方名称所扮演的便是镇压性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混合体:一方面政府进行强制手段进行命名,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促进新加坡人民对地理位置的熟悉感,潜移默化地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1) “标准化”华文街路译名的实施

在建国初期,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为了促进国家繁荣进步,人民应该学习英语作为跨国贸易、求职、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沟通工具(Gopinathan, S., 2003: 20-21);此外,英语也可作为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籍人士四大种族间相互沟通的工具。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地理环境来强化意识形态,只适用于读得懂、听得懂这些语言与文字的受众。但是出于当时以英语为重的现实考量,新加坡政府对于街道名称翻译成华文并不重视,直至六十年代后期街路地方名称仍然只用罗马拼音。对于当时大部分缺乏英文教育的民众而言,罗马拼音晦涩难懂。

为了使全国人民在国家机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街路地方名称必须顾虑到不谙英文和马来文的受众。因此,新加坡政府于1967年成立了“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Street Names in Chinese),以提供及传播官方华文街路地方译名。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的责任是将当时“存在着的华文街路译名”系统化和简化,“以避免混乱和令人不满意的翻译发生”^⑥,并确保街路地方译名“不仅在音译上忠于原文,而且优雅和富有意义”(The Straits Times, 1970: 2)。

政府的这一举动旨在推广标准华文,阻止街路非官方方言俗称的蔓延。早期华人多以方言相互沟通,分裂为个别的方言群,难以融为一体。街路地方华文译名不选择以耳熟能详的方言俗称命名而是重新进行命名工作,显示了政府有意重整方言与标准

华文的地位,将标准华文推上“正位”。街路地方译名“标准化”也突显了翻译的重要性,即传达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达到相关政治目标,通过团结华人以达到最后建构新加坡人民国族认同感的最终目标。

(2) 街路地方名称的汉语拼音化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发现不同方言的持续使用导致华语无法成为所有华人间沟通工具(Gopinathan, S. 2003: 24)。因此,时任总理李光耀(1923—2015)推出了“讲华语运动”,并反对使用方言。

1979年11月,新加坡政府宣布所有学校须从1981年开始,将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姓名汉语拼音化,摒弃传统的用罗马字母根据方言发音拼写的方式。当时的教育部解释道:这是教育部为了迎合“讲华语运动”所做的决定;一旦学生的华文姓名统一以汉语拼音标识后,人们便再难从姓名的字母拼写及发音方式中判断学生的籍贯地,从而避免继续形成不同的方言群体(The Straits Times, 1980: 1)。

八十年代初,汉语拼音的运用延伸至街路地方译名上。政府试图将一些原本以方言命名的区域和城镇改以汉语拼音取代。例如,“后港(念 aukang)”早期是一个潮闽籍移民聚居的乡村,在福建和潮州话的意思是河的后端(吴彦鸿, 2008: 159)。它在八十年代建为新城镇之后,以汉语拼音命名为“hougang”。“碧山(念 Peck San)”以汉语拼音命名为“bishan”:十九世纪后期居住的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广东广州府、惠州府以及肇庆府,“碧山”取自广东人的墓地“碧山亭(Peck San Theng)”。

早期和牛有关的活动在实龙岗路一带繁荣发展。由于有许多栅栏,那里被称为“Kandang Kerbau(甘当加宝)”,马来文“kerbau”是“水牛”之意,“kandang”是“栅栏”之意(吴彦鸿, 2008: 149)。福建籍移民为这个区域取名为“竹脚(念 tekka)”,而“竹脚巴

刹”为“Tekka Pasar”。竹脚巴刹在1982年拆迁至新地址后,政府重新以汉语拼音将它命名为“Zhujiac Centre”(竹脚中心)(Yeoh, B. S. A. 2003: 126)。

译名同样受汉语拼音化影响的还有新镇武吉班让和义顺区。“武吉班让”系马来文 Bukit Panjang 的音译,即“长山”之意,指从武吉班让到南部武吉知马绵延的低山。由于汉语拼音化的风潮正盛,建屋局便将 Bukit Panjang 重新翻译为“正华”(Zheng-hua)。此外,“义顺”系以义顺区先驱人物、树胶大王林义顺(Lim Nee Soon)的名字命名;当地在建为新镇时,被建屋局命名为“Yishun”(义顺)新镇。

但是,方言名称汉语拼音化的政策引起了轩然大波及诸多争议。一些提出异议的人士认为耳熟能详的方言街路地方名称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分子”(The Straits times, 1987: 1),并且“对于新加坡人来说有着强烈的历史意义”(The Straits times, 1987: 1),而新式的汉语拼音化读音会使老一辈的新加坡人感到“困惑”(The Straits times, 1991: 30),“也会造成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们对这种发音不够敏感”(The Straits times, 1991: 30)。如 Zhujiac Centre,不明白的人们乍读之下犹如“猪脚中心”;而 Yishun 与先驱 Lim Nee Soon 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词源关系。因此,在1987年,国家发展部部长宣布保留包括方言名称在内的旧街路地方名称。那些已被改名的如“Zhujiac”和“Yishun”将不会再改,而“正华”因为受到居民的大肆反对而改回马来文的音译“武吉班让”。

(二) 意译的采用与发展

上文,我们探讨了在五六十年代间,大多数的街路地方名称多以音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且译名中也杂揉了方言的读音及其字面意义。直至“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的设立,这些街路地方名称和译名才逐渐被统一化,翻译方法以及选词用字方面均被改变更正。

表4 (粗体字为音译,斜体字为直译,下划直线为方言音译,下划曲线为意译)

官方英文街路名称	潘醒农译本	星马通鉴译本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Upper Circular Road	上沙球拉路	盒吧沙球拉路	沙球劳路 ^{上段}
Upper Cross Street	上乞洛士街	盒吧乞洛士街	克罗士街 ^{上段}
Upper Hokkien Street	上福建街	盒吧福建街	福建街 ^{上段}
Upper Pickering Street	上必麒麟街	盒吧必麒麟街	必麒麟街 ^{上段}
Raffles Quay	莱佛士基	莱佛士溪墩	莱佛士码头
Boat Quay	吻基	吻基	驳船码头
Collyer Quay	歌烈溪墩	歌烈溪墩	歌烈码头
New Bridge Road	纽吻立芝路,新桥路	纽吻立芝路	新桥路
South Bridge Road	哨吻立芝路,桥南路	哨吻立芝路	桥南路

通过以上表4中不同译名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到了七十年代,《新加坡街道指南》在译名上所做出的改变。最明显的便是“Upper”的译法选用,摒弃了直译“上”和方言音译“盒吧”,而改用意译“上段”作为译名,因为意译的选用能将街路的地理位置更有效地传达给受众和游客,而且能淡化方言的使用。同时,专名的音译几乎被保留下来,只在部分遣词用字上做出些许改变。

意译在这个时期的采用与发展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通过表4中的对比发现,最明显的差别便是《新加坡街道指南》没有编入方言音译的译名。其实,这与我们前文所探讨的对于方言使用的淡化息息相关。这个时期,“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这一官方街路译名机构已经出现。政府当时的宗旨是希望通过淡化方言色彩、推广运用标准华文,来达到所有方言派系可以有一共通的语言进行沟通,打破各派系之间的隔阂、分散个别派系的凝聚力,促成所有华人的心念统一。在官方的街道指南里,通过意译、直译的方式进行翻译,以摒除任何方言读音与文字,不暗示方言派系各自的聚居地,淡化方言派系间的隔阂,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三、新加坡独立后期(1980年代后期至今)街路地方旧译名的保留和新译法的采用及其体现的国家认同意识建构

(一) 新旧译名与历史追溯

新加坡独立后至八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的两项主旨分别为发展经济及淡化种族与文化色彩。这个时期,由于刚脱离马来亚自成一国,新加坡政府认为应该摒弃殖民与合并失败的历史,面向未来。

上文所及的街路地方华文译名的标准化、汉语拼音化等,都旨在淡化殖民历史以及建构新的国家意识。

从八十年代起,随着新加坡经济的不断发展,李光耀觉得“隧道末端[已经开始]出现曙光了。”(The Straits Times, 1984: 12)这一时期的新加坡政府开始进入引导民众寻根、追溯历史的工作阶段。

新加坡政府十分清楚,若希望国民可以对国家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就要为他们创造集体性的回忆、共同的成长背景和共享的历史记忆。而街路译名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从上文展现的街路译名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街路译名从非官方至官方标准化的经过以及改变,而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又保留了个别不同译法译出的名称,新加坡街路译名由此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形式。随着八十年代开始兴起通过追溯历史的形式以建构国家认同意识的思想潮流,保留这些译名便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1) 原有译名的保留(表5)

从表5的例子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街路命名及其翻译上的改变。

如前文所述,1968年的新多元文化框架促使以马来文为街路进行命名的方针停摆。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更是必须“停止用马来文以花朵、水果、动物的名称为街道命名”,避免以马来文“Jalan”取代英文“Road”,并且“细心复审任何对于马来街路名称的异议”(Dewan Bahasa Files 29 May 1968: Files 2/67, 70/59, and 515/59)。纵使如此,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已拟定的译名还是被保留下来,但新街道的命名与译名则需遵循新方针的指示。

表5

街路名	东南亚地名街名录	星马通鉴	新加坡街道指南 1970 (新加坡文化部, 1970) — 1990(新加坡: 迈迪脉思出版社, 1990)	新加坡街道指南 2013(新加坡: 迈迪脉思出版社, 2013)
Jalan Tiga Ratus	惹蘭地加拉突士	惹蘭地加拉都士街	惹兰迪卡拉都士	惹兰迪卡拉都士
Jalan Nuri	惹蘭那里	惹蘭奴利街	惹兰努力	惹兰努力
Bukit Panjang Road	武極班讓	武吉班讓	武吉班让路	武吉班让路
Mount Sinai Road	—	—	西乃山路	西乃山路
Lorong Limau	羅郎里毛	羅郎林毛	罗弄柠檬	罗弄柠檬
Lorong Realty Park	—	—	实业园巷	实业园巷

由于新方针的实施,产生了两种通名在道路指南上的出现,一方面马来文“Jalan”保留下来,同时英文“Road”则作为新通名而使用。不过,两者在翻译成华文译名后却差异明显。“Jalan”和“Road”的

意思为“街”或“路”,但是只有“Road”被译为“街”或“路”,“Jalan”则保留音译的方式,译作“惹蘭”。同样,“Bukit”在马来文中为“山”的意思,但并非所有以“Bukit”命名的名称译为“山”。此外,“Lorong”

在马来文中为“巷”的意思,但也没有被直译为“巷”。如此,原本的马来文通名以及后来启用的英文通名都沿用至今,从而凸显了马来文在新加坡的地位与历史意义。

前言所及,虽然1967年“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受政府指示以马来文进行命名工作,在译名方面均以音译法进行翻译以保留马来名称的垄断地位,但这一政策在一年后便被多元文化方针取代。那么,为什么直至今日仍然会音译这些马来通名呢?为什么马来通名的翻译会出现分歧,如将“Lorong”译为“罗弄”和“巷”、“Bukit”译为“武吉”和“山”的现象同时并存?

这一做法同样与国家认同的建构有关。首先,“Jalan”为“惹兰”、“Lorong”为“罗弄”、“Bukit”为“武吉”等通名的音译继续保留和沿用,可视作政府对历史的尊敬与追溯。新加坡目前为止仍保留着这些马来通名,甚至还把原本在译名里所添加的华文通名删除,还原原本的音译版本(如《新马通鉴》的“惹蘭奴利街”被删除,还原为“惹兰努力”的马来语音译)。新加坡在受英国殖民统治之前为原住民的聚居地,以马来文命名的街道已经存在,莱佛士登陆并开发这个岛国时仍选择保留这些名称,因而沿用至今。选择音译是保留原本名称历史意义的方法,在不扭曲原语名称的前提下进行音译。这一做法能不断强化新加坡发展前的历史,即如何从一个原住民居住的东南亚岛屿,被英国殖民统治后再发展为移民国家,并最终演变成现在的新加坡。

(2) 新名旧译: 街路地名称“再方言化”的趋势崛起

“汉语拼音化”政策前后历经七年,从1981年起开始实施,至1987年国家发展部部长宣布保留包括方言名称在内的旧街路名称为止。从1987年后,新开发的市镇以及路段若有现成的方言名称便继续沿用,甚至街道的新命名都细述着地方的历史,例如盛港新镇、蔡厝港新镇和油池市镇等等。

“盛港(念 Seng kang)”在福建话是丰盛渔港的意思,以前称为“港脚(念 Kang kar,现为盛港一个路段的名称)”,即河港的旁边,因为盛港、后港区域曾为渔村渔港。盛港丰富的历史也将它塑造出一个水手市镇的主题——“海员的市镇 Town of the Seafarer”(The Straits Times 2000: 28)。此外,盛港早期也是种植胡椒、树胶和黄梨的场地,因此,新镇的街道和社区皆以与海和农作物有关的名字命名和翻译。盛港的邻里社区分为两半,三个社区以海为主题,如

河谷(Rivervale)、康埔桦(Compassvale即罗盘谷)、安谷(Anchorvale即锚谷);三个以种植园为主题如芬维尔(Fernvale即羊齿植物谷)、棕谷(Palmvale)和可可谷(Cocovale)(吴彦鸿 2008: 162)。

蔡厝港新镇于八十年代兴建。“蔡厝港(念 Chua Chu Kang)”源自于潮州话“港主”,顾名思义与早期的港主制度有很大关系。十九世纪中叶,天猛公依布拉欣统治全柔佛时,召集华人垦荒,且以潮籍人士居多。他由此成立了港主制度,即华工每找一条河流,就沿河开垦种植甘蜜胡椒,而他便给种植者港契,让开垦者拥有河流的所有权,凡持有港契的人均称为港主。蔡厝港便是指港主是一个姓蔡的人士。同样,林厝港指的是一个姓林的人士,而杨厝港则为一个姓杨的人士(吴彦鸿 2008: 214-215)。油池市镇是蔡厝港新镇的一部分,发展于1997年。

“油池(念 Yew tee)”源自于潮州话,也就是贮油的地方,它曾经是个乡村。在日据时期,人们将油贮藏在那里因而得名。

以上三个名称源自于早期华人所取的方言俗称,并非当时的官方名称。从1979年“讲华语运动”推出以来,新加坡政府就一直反对民众使用方言,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政府却又允许方言成为为官方街路名称的一部分。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我们注意到,1980年代后期“讲华语运动”已成功推翻了过往方言的强势地位。官方选择沿用这些方言名称出于对名称历史的尊重,选择继续音译这些方言名称并以罗马拼音拼写,以竭力保留方言名称的“原汁原味”,鼓励人民去探索和追溯历史。

使用音译法的原因随着年代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从最初官方译名的缺失致使人们为了不懂英文的人试图音译官方罗马文字的名称,直至19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保留名称的原创价值与历史意义来建构新加坡人民的共同历史,可以看出音译法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人不应以新加坡未开发、环境萧瑟时期的历史为耻,而是应该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叙述饮水思源,缅怀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二) 原有译名的保留: 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国家认同意识建构

(1) 新加坡多元文化环境的凸显

除了上述所及音译法在政府引领民众追溯历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外,音译法亦能展现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语境。以四大官方语言为街路进行命名无疑突显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性质,并衬托出官方对于四大语言的尊重。以裕廊(Jurong)区域为例:

裕廊在六十年代发展成工业区,当时“街道、建筑物和产业命名委员会”在为裕廊工业区内的三十多条街路命名时,其肩负的责任即是“强调以四大官方语言进行命名工作……以反映新加坡多元语境、多元种族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性质”(Dewan Bahasa Files 2 May 1968: Files 2/67, 70/59, and 515/59)。此外,街路名称也必须包含“企业”和“进步”等相关字眼,以反映新加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懈努力。

表6可见裕廊工业区内的街路均以四大官方语言命名,用英文罗马拼音为主的方式。特别的是,华文以及淡米尔文的名称是以音译的方式,以罗马拼音文字拼成,以便不同种族的人们能容易看懂。即便如此,译名仍保留了各语言的发音,因此虽然所有街路名称以英文展示,但还是能展现同中存异、异中存同的特色,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独特性。音译的方式保留了不同语言在英文译名中的独特发音,衬托出四大种族文化在新加坡的共同地位。

通过表7,可以发现这些街路名称的独特之处皆为多语混用的命名方式,即马来文和华文的结合。这种命名方式非常本土化,同样展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质。为了在译名中继续保留并展现这种特

表6

语言	街路地名称	译名	意义
英文	Corporation Road	企业路	—
	Refinery Road	炼油厂路	—
	Pioneer Road	先驱路	—
	Enterprise Road	事业路	—
华文	裕群路	Joo Koon Road	—
	繁荣路	Fan Yoong Road	—
	顺利路	Soon Lee Road	—
	如意路	Joo Yee Road	—
马来文	Jalan Besut	惹兰百树	炼金
	Jalan Buroh	惹兰布罗	工人
	Jalan Jentera	惹兰仁特拉	磨坊
	Jalan Pesawat	惹兰柏沙瓦	工具
淡米尔文		Neythal Road	编织

质,混合译法的运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图表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混合译法:(一)音译和直译;(二)音译和改译。

表7

混合译法	街路地名称	译名
音译+直译	Toa Payoh	大(华文直译)+巴窑(马来文音译)
	Jalan Tiong	惹兰(马来文音译)+冢(华文直译)
	Lorong Chuan	罗弄(马来文音译)+泉(华文直译)
音译+改译(换字)	Tiong Bahru	中(华文改译)+峇鲁(马来文音译)

音译和直译的混合译法体现在表7中:

a) “Toa Payoh”由两种语文组合而成,“Toa”为潮闽话,为“大”的意思,“Payoh”则取自马来文“paya”,指“沼泽”;合在一起即为“大沼泽”之意。指Toa Payoh一带曾为一大片沼泽地。译法选择上,“Toa”直译为“大”,“Payoh”则音译为“巴窑”。

b) “Jalan Tiong”的“Jalan”为马来文“道路”的意思,“Tiong”则是潮闽话“冢”的意思,即坟场路;因早期该区有许多坟场而得名。译法选择上,“Jalan”音译为“惹兰”,“Tiong”则直译为“冢”。

c) “Lorong Chuan”的“Lorong”是马来文“车道”的意思,“Chuan”则为潮闽话“泉”的意思。译法选择上“Lorong”音译为“罗弄”,“Chuan”直译为“泉”,取遇水则发之意。

音译和改译的混合译法则体现在“中巴鲁”这

个译名上。“Tiong Bahru”中的“Bahru”为马来文,指“新”的意思,音译为“巴鲁”。“Tiong”原为潮闽话“塚”的意思,“Tiong Bahru”原为“新塚”之意,得名自该处曾建盖坟场。“华文街名标准化委员会”成立之后,其审核事项即包括修订或尽可能避免采用早期译名中容易引起误解、令人感到不快的汉字。“塚”指代坟墓,对华人而言并非吉利的象征,若沿用“塚巴鲁”为地方命名显然不合适,委员会遂取“Tiong”的谐音,改译为“中巴鲁”。

那么,这种混合译法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又有怎样的意义?上文提到的以不同语言为街路地方进行命名工作,然后以音译法保留多元文化的性质是“同中求异”的手段,强化个别种族在新加坡的存在以及重要地位;混合译法则“异中求同”的手法,将不同种族的语言融为一体,形成新加坡本土化的

特色,强调并推广新加坡独有的“四合一”种族身份。新加坡人不能否定先辈从何而来的事实,但是随着他们落地生根、不分你我种族、共同创建了新加坡这个国家,这种包容、融合的行为成为塑造“新加坡精神”的一部分。街路地名通过音译和混合译法保留这种独特性,从而突显了族群身份。

(2) 强化不同种族文化的存在

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是新加坡政府采用的认同意识建构手段。以上分析了音译与混合译法对于认同意识的建构,下文将以“牛车水”为例对意译的采用进行剖析。

表 8

译法	官方名称	华文名	华文名来源	官方名称指射
意译	Chinatown	牛车水	Kreta Ayer	“唐人街”的意思

在十九世纪开始的中国移民潮中,华人聚集的地方形成了该地方独特的文化特色,因此便有了“唐人街”、“中国城”等名称。新加坡的华人结构也是由华人移民组织而成,也有着自己的“Chinatown”,对应的华文名为“牛车水”。

“牛车水”一名源自于马来名称“Kreta Ayer”,即“水车”之意,因为早期当地人都是用水牛拉车运水,华人遂用“牛车水”对应马来名称“Kreta Ayer”。“Chinatown”则是由英军按照不种族划分土地而命名的。虽然,这种种族隔离措施后来停止使用,但是新加坡政府却沿用了“Chinatown”作为牛车水的官方名称,而华文名则继续使用“牛车水”。由此可见,“Kreta Ayer”和“牛车水”的得名早于“Chinatown”,所以“Chinatown”应被视作为官方译名,将牛车水作为华人聚居的区域而意译为唐人街。

同样,新加坡政府也保留了“小印度”和“甘榜格南”这两个印度族群和马来族群各自聚集的地方,并将它们推广为新加坡的热门景点。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继续运用英殖民地时期所取的名字,是为了实施同中求异的认同意识建构手段。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手法能有效地促使新加坡人意识到“四合一”的族群身份。多元文化代表着新加坡人的特性,但是并不代表所有文化在大熔炉里被同化。新加坡就犹如当地美食罗惹(Rojak)一样,由四大种族分别代表着各自的原材料,缺一不可,但是在细细品尝中仍能体会出属于不同材料的独特滋味。

四、结语

可以想见,通过街路地方名称以及译名来建构

国家认同意识将持续作为新加坡政府在街路地方命名工作中优先考量的条件。文中提及的“盛港”、“蔡厝港”和“油池”这几个较新的新镇名称都反映出政府的用心——曾经遭唾弃的非官方俗称最终登上“大雅之堂”,成为正式的官方译名。因此,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加上现在新加坡年轻一代崇尚复古风,街道俗称有望重新在命名及译名时加以使用。

而在翻译技巧的使用上,音译将继续作为最受青睐的译法,这是因为音译法能降低译名的变动性,使不谙各自语言的不同种族人民能轻易听明白街路地方名称。如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新建的蓝色滨海市区线(Downtown Line)的各站名称以及译名即多采用了音译法。“Rochor”译为“梧槽”、“Bendemeer”译为“明地迷亚”、“Telok Ayer”译为“直落亚逸”、“Jalan Besar”译为“惹兰勿刹”、“Kaki Bukit”译为“加基武吉”、“Geylang Bahru”译为“芽笼巴鲁”等等。此外,以英文命名的新名称则较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如“Hillview”译为“山景”、“Beauty World”译为“美世界”、“Sixth Avenue”译为“第六道”、“Downtown”译为“市中心”、“Expo”译为“博览”等等。

本文通过梳理新加坡街路的译名策略和不同翻译方法,可以发现新加坡街路译名反映了新加坡不同政治、历史发展时期的意识形态,让我们看到“翻译并不是一项‘单纯’(innocent)的工作,而是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王宏志,1999:33-34)。

注释:

- ① 在1920年代,由于市政事务日渐复杂化再加上各专员间分工的必要性,街路名称命名的责任便交予一个特定的委员会。含有市镇评估员建议的会议记录会先转发给市政主席、委员会成员,甚至偶尔发给各政府部门的总领让他们进行审核,最后才转发予特别委员会。参见 Yeoh, B. S. A., “The Naming and Signification of Urban Space: Municipal versus Asian Street-names and Place-names”, *Contesting Space in Colonial Singapore—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M].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 p237.
- ② 吴彦鸿根据现今21世纪新加坡的街路名称进行分类,罗列出了十大类型。笔者则依照节的时间段(19世纪—20世纪60年代)而摘取一些类型。参见吴彦鸿《新加坡街名由来》[M]. 新加坡:宏观工作厅,2008,页5。
- ③ 描绘性街名指的是街道命名的描绘性质,源自街路附近

的特色、地标或其它标志。例如码头(驳船码头、克拉码头等)、地标(宝塔街、大学路等)、地形特色(里峇峇利即 River Valley 河谷、禧街即 Hill 山丘)等。

- ④ 主题性街路名称即为一个地区设一个主题并以此进行命名工作。例如歌剧名称(卡门[Carmen]街、天鹅湖[Swan Lake]道)、水果名称(罗弄榴莲、罗弄、黄梨、红毛丹路、赤果路)、植物名称(捷士民路即 Jasmine 茉莉花、玛利哥通道即 Marigold 万寿菊)等。
- ⑤ 相关论述可参见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孟登迎译、陈越校,收录于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页 320 - 375。
- ⑥ 如“Raffles Place(莱佛士坊)”被翻译成“莱佛士不礼”,而“Woodbridge Hospital(板桥医院)”甚至被译为“House of Devils(恶魔之家)”。参考“When Mental Hospital was ‘House of Devils’”,*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3 June 1970, p2.

参考文献:

- [1] 崔贵强. 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M]. 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
- [2]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 新世纪高级汉语词典[Z]. 新加坡:怡学出版社 2000.
- [3]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4] 吴彦鸿. 新加坡街名由来[M]. 新加坡:宏视工作室 2008.
- [5] 许永顺. 记得,大坡牛车水[M]. 新加坡:许永顺工作室 2002.
- [6] Buckley, Charles Burton.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9—1867* [M].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 [7] “Don't pinyinise names of familiar places”,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27 December 1991: 30.
- [8] Gopinathan, S. and others, eds. Language policy changes 1979—1997: politics and pedagogy [A]. In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Issues and Trends* [C].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 [9] “HDB to keep old place names: Dhana”,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19 March 1987: 1.
- [10] Homi K. Bhabha. *Nation and Narr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1990.
- [11] Lee Kuan Yew. “Speak Your Language at Home” [R]. “Speak Mandarin ‘campaign’s 30th anniversary launch in Singapore”. Singapore Government Press Centre, 17 March 2009.
- [12]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Naming of Roads and Streets (MMACNRS) [C]. Dewan Bahasa Files. Ministry of Cultur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14 March 1967.
- [13]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Naming of Roads and Streets (MMACNRS) [C]. Dewan Bahasa Files. Ministry of Cultur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17 Jan 1968.
- [14]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Naming of Roads and Streets (MMACNRS) [C]. Dewan Bahasa Files. Ministry of Cultur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2 May 1968.
- [15] 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Naming of Roads and Streets (MMACNRS) [C]. Dewan Bahasa Files. Ministry of Culture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29 May 1968.
- [16] “Pinyin Names (in Pre-Primary and Primary One Classes) Next Year”,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20 November 1980: 1.
- [17] “PM recalls the past”,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16 November 1984: 12.
- [18] “Sengkang takes shape”,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8 February 2000: 28.
- [19] Tay Kheng Soon. “A Note on My Role in the Singapore Street Naming Committee” [Z]. 官方网站 <http://www.rubansation.org>, 12 October 2005.
- [20] “When Mental Hospital was ‘House of Devils’”, *The Straits Times* [N]. Singapore, 13 June 1970: 2.
- [21] Yeoh, B. S. A.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s in Singapore: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M].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Calls for its Own Creative Notions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though very active and prosperous , has been dominated in recent decades by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 with few creative Chinese notions. In the early years ,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yielded many fruits but , due to the lack of scientific reasoning , could hardly be part of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a lo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streaming into China ,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s on the whole guided by western theor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e are now going into the phases of “imitation” and “creation” after the period of “introduction” and “digestion”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It is time for us to stop worshipping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 and establish , based on 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 the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our own.

[**Key words**] the creative notions;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mitation; creation

Practitioner Capabilities and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A Survey-based Analysis of Globalizing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Abstract**] At present , software localization , website globalization ,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 marketing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 changing the landscape of language service industry , affecting relative job and employment requirements. This trend calls for a reflection on present MTI educ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urvey on the recruitment advertisements posted online by the world Top 100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 (LSP) . By comparing their demand levels on different practitioner capabilities in four major job categories , the paper provides a more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practitioners of translation , aiming to shed some light on MTI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 the the paper offers five suggestions , hoping that MTI education in China could be geared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services; practitioner capabilities; MTI education; recruitment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 and the Forg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Street Names in Singapore

[**Abstract**] Street names express the power and ideology of the person or organization that names them and reflect the government’s intangibl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a tangible wa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of street names during three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 namely , pre-in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19th century-early 1960s) , in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1960s—1980s) and post-independence of Singapore (1980s-present) . The paper cross-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political ,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 probing into the reasons in the usage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ideology behind these names , before unrav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eet names in Singapor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Translation; Singapore; Street Names; National identity; Ideology

Translation Endeavor Related to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919—1948)

[**Abstract**]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ical of the Association. Altogether , 190 issues were published in 30 years. This paper briefly re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sociation , the Journal and the forms and types of its translation versions. It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me version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at the tim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a’s agriculture. No doubt , the journal did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agronomy by introducing west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Key words**]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agronomy;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